

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丛/书

(王先明 / 主编)

新旧学制更易 与乡村社会变迁

XINJIU XUEZHI GENGYI
YU XIANGCUN SHEHUI BIANQIAN

◆ 郝锦花 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新旧学制更易 与乡村社会变迁

ISBN 978-7-01-007646-1



9 787010 076461 >

定价：25.00元

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丛/书

(王先明 / 主编)

新旧学制更易

与乡村社会变迁

XINJIU XUEZHI GENGYI
YU XIANGCUN BIANQIANQIANQIAN

◆ 郝锦花 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乔还田

封面设计:徐 晖

责任校对:张 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旧学制更易与乡村社会变迁/郝锦花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

(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丛书)

ISBN 978-7-01-007646-1

I. 新… II. 郝… III. ①乡村教育-研究-中国-1990~1937

②乡村-社会变迁-研究-中国-1900~1937 IV. G725 C91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1398 号

新旧学制更易与乡村社会变迁

XINJIU XUEZHI GENGYI YU XIANGCUN SHEHUI BIANQIAN

郝锦花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9.5

字数:221 千字

ISBN 978-7-01-007646-1 定价:2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总 序

就历史变革的进程而言,中国乡村的结构性变革始于20世纪初年。而且在整整一个世纪的发展进程中,乡村社会变迁始终是中国历史变迁的主体内容,这不仅因为在区位结构中乡村占居绝对的多数,而且因为乡村的生活模式和文化传统,从更深层次上代表了中国历史的传统。即使对于整个近现代史而言,近代化或城市化进程,本质上也是乡村社会变迁的过程。

20世纪初期开始的中国乡村社会变革虽然在世纪末取得了质的飞跃,但变革的历史进程却仍在继续。“20世纪之中国乡村社会变迁”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它不仅是从“长时段”探讨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规律性的课题,而且也是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尤其是农村变革、发展道路的重大课题。这是它所独具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之所在。

当“三农问题”构成制约中国社会发展和实现现代化进程的突出问题时,对它的关注和寻求解脱之路的现实需求,催促着我们不得不对它进行学理或学术层面的分析。诚如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张荫麟说:“我们的历史兴趣之一是要了解现状,是要追溯现状的由来,众史事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Genetic Relation)有深浅之不同,至少就我们所知是如此。按照这个标准,史事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愈深愈重要故今通史家每以详尽略远为旨。”

(张荫麟:《中国史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重印本,《自序》)因此,由现代回观历史,从历史审视现代,就必然成为现代史学一个不容回避的课题。

毋庸置疑,困扰当代社会发展的“三农问题”,有着近代以来自身形成、发展和演变的线索,当然,也是近代历史进程中人们所曾着力解决的问题。人们早已认识到,虽然近代农民生存条件和生存状态与传统社会并无质的差别,但是,近代以来的农民生存则更多地呈现出社会变迁中的具有时代性的特征。因为“我国古时重士农,轻工商,所以农民的地位非常高尚。”但到了近代以后,“工商业一天一天的发达,工商的地位逐渐提高,……农民的生活一天一天的变坏,他们的地位一天一天的降低……”(杨开道:《我国农村生活衰落的原因和解救的方法》,《东方杂志》1927年第24卷第16号)。近代中国农村问题的出现和累积之所以不同于传统时代,就在于它不仅受到社会政治变动所引发的权力结构的动荡影响,也不仅受到农村阶级结构内在规律引发的土地集中和贫富分化的周期性振荡,而且更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于乡村社会生存和发展形成的巨大压力和分解力。立足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探讨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就成为我们历史研究者的责任。

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凸显可以说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乃至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出现的历史主题。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既承负着现代化进程也承负着半殖民地化进程的双重困厄,因而乡村社会变迁更多地表现为危机的加剧、交错和寻求解脱危机的基本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问题,必然是超越乡村本身的问题。“我们知道,现代文化虽然并不一定与农村绝缘,但它是附丽于工业发展而进化的。同时在另一方面,由于农业经济之急度崩溃,必然要发生愚贫弱私的现象,农业建设终究不能解救农民

的贫困”(齐植璐:《现阶段中国经济建设论战的批判》,《东方杂志》1935年第32卷第24号)。因此,在探求中国乡村社会发展同时也是探求中国现代化出路的讨论中,汇聚的学识和学科范畴也是极其广泛的: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等等。这些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范畴都将与历史学的实证方法相结合,构成这项研究的特色之一。

历史学的功用,可以在超越一时的模式,在历史解释的重构——比较和检验中,获取更深层的理性认识。

目前,学术界对此还缺乏深入的、系统的研究。此丛书的研究成果多是研究者长期学术积累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经反复修改提高而成,具有学术上的创新性、前沿性和研究主题的系统性、互补性。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王 先 明

目 录

总 序	王先明 (1)
绪 论	(1)
一、问题的提出	(1)
二、学术史的回顾	(3)
三、框架和思路	(15)
第一章 新旧并存的乡村教育	(19)
一、近代乡村新学教育的萌发	(19)
二、乡村新式学校与旧式私塾之争	(24)
三、私塾的文化霸主地位	(32)
四、乡村私塾的趋新改造	(44)
第二章 乡村新学势弱的原因	(58)
一、新学教育经费的短缺	(59)
二、学校师资力量的薄弱	(80)
三、社会支持力量的缺乏	(121)
第三章 新学教育与乡村现代化的启动	(170)

一、现代学制在乡村社会的确立	(170)
二、社会流动的加速和社会动员的增强	(177)
三、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的新变动	(188)
第四章 新学教育与乡村现代化的受挫	(199)
一、乡村精英的离乡	(199)
二、乡村文化的衰落	(216)
三、乡绅统治的变形	(226)
四、乡村危机的爆发	(235)
第五章 乡村精英离乡的新学教育原因	(240)
一、新式学校的城乡布局失衡	(242)
二、各类专门学校及专业设置比例失调	(251)
三、新式学校的教学内容与乡村社会疏离	(259)
结 语	(268)
一、清末民初乡村教育的几个特点	(268)
二、乡村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新探索	(275)
三、乡村现代化道路的几个特点	(279)
主要参考文献	(286)

绪 论

一、问题的提出

众所周知,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乡村是城市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母体,社会的演化进步,归根结底体现在乡村的发展和变革。“就历史变革的进程而言,中国乡村的结构性变革始于20世纪初年。而且在整整一个世纪的发展进程中,乡村社会变迁始终是中国历史变迁的主体内容,这不仅因为在区位结构中乡村占据绝对的多数,而且因为乡村的生活模式和文化传统,从更深层次上代表了中国历史的传统。”^①当前我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乡村仍然是中国的主体,城市在整个中国仅仅只是一座座孤岛,农村人口占总人口70%左右。然而,我国城乡普遍地被人们读解为贫/富、先进/落后、文明/野蛮、现代/传统二元价值对立模式,传统乡村文明已然被排斥于“现代文明”的视野之外。城乡差别像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横亘在我国城市和乡村之间,并且有着不同程度的扩大趋势。这反映在我国的教育领域里亦是如此:“我国教育的话语权、决策权集中在城市阶层,更潜在地使我们的教育政策与

^① 王先明:《中国近代乡村史研究及展望》,《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第259—289页。

主流教育话语更多地带有‘城市取向’”；^①我们教育理论界在讨论教育问题时，主要的着眼点是城市，而广大乡村的教育境况遭到了有意或无意的忽视。近年来，沸沸扬扬的素质教育、“减负”，乃至现今的热点“创新教育”等主流教育话语，无不代表着城市教育的呼声。我们乡村教育处于彷徨、焦虑的状态之中：提倡科学整体育人观念，又没有合理科学的模式；提倡课堂教学改革，师资、设备跟不上；提倡“减负”，只靠“高压”，家长、教师不知所以然。在公立高等学校招生名额的分配上，大城市也占有着很大的优势，乡村的学生，往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可能赢得与城市里的学生同样的机会。“城市取向”的现代化教育有一个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乡村精英义无反顾地抛弃了养他、育他的乡村社会，而去滋养令其久已倾心的城市。这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必然？抑或是旧中国教育制度的延续？对此我们不能视而不见，亦不能不加以深思。

20 世纪初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深刻的大转型、大变革时期，同时也是中国教育制度新旧转型的时代。新与旧的交织，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改变了传统旧学一统天下的教育模式，强烈地冲击了人们原有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加速了传统社会的分化和瓦解。然而，历经了二三十年的社会变迁之后，一群受过新学教育的知识青年却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旨在解决中国社会出路的“乡村建设运动”，其社会背景正是缘于当时的乡村的教育危机和社会危机。那么，乡村的社会危机与教育危机有何联系？乡村教育危机的出现是教育制度的改革造成的吗？一部分知识分子何以以乡村教育作为解决乡村问题乃至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途径呢？带着这几个疑问笔者查阅了大量的史籍资料，虽然找到了答案的某些蛛

^① 刘铁芳：《乡村教育的问题与出路》，《读书》2001 年第 12 期。

丝马迹,但是却发现以往学界对于以下几个问题却未能给出明确答案:1. 新学教育制度在乡村社会的具体落实情况究竟如何?为什么乡村私塾在学制改革以来始终占据着文化教育领域中的霸主地位?2. 新旧学制之转换对于乡村社会在区位结构和文化结构中的地位影响如何?3. 为什么在旧学教育制度下,乡村精英能安于其乡,而在新学教育体制下,乡村精英却更愿意脱离草根而流入城市?难道说这仅仅是因为天灾人祸等一些人所皆知的外在原因吗?如此等等。鉴于此,本文拟以学制转轨为切入点对清末民初乡村社会所发生之种种变化及其原因作一实证性的考察和分析。

二、学术史的回顾

近代新学教育是相对于清代以科举制为核心的一整套旧学教育制度而言的。旧学教育是以私塾和书院为主要教育场所,以儒家经典及封建伦理为主要教学内容的传统教育体系。新学教育制度则采用由西方移植而来并经过本土化的近代学校制度,以新式学堂为其主要的教育场所,以充满着新的认知形式、新的价值观念的近代“新学”为主要教学内容,包括从19世纪40年代就已开始传入中国并为大多数传统士人所不齿的西学知识即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①

^① 王先明认为,近代“新学”是近代中国学术文化的一种新的形态,是中学在适应时代变革进程中以吸纳西学为方式的一种自身更新的产物。它是在中西会通基础上形成的与传统中国旧学体系在知识体系和价值标准上全然不同的新的知识系统;它在结构体系上兼有中学和西学的二元知识因子,因此既与单纯的西学也与传统的中学一元结构相区别;在制度层面上新学以近代学校体制和专业人才培养为标志,与以书院和科举八股人才为标志的旧学体制相区别;在社会政治作用上,新学是晚清一系列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的学理基础,并以此从学理层

近代以前中国社会以传统的旧学教育一统天下。伴随着西学东渐的进程,19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传教士所创办的教会学堂的示范下中国近代新学教育萌芽了。由教会学校、洋务学堂、新式书院构成的新学体制,是完全独立于传统旧学体制之外的新学制。它的出现及其发展,打破了中国传统旧学体系一统天下的局面,并形成了新旧学制双轨并行的特点。然而在整整的半个世纪里,在艰难曲折中初步成长起来的新学教育还不足以形成完全取代旧学的

面上与维护旧制度、旧政体的旧学相对立;在时代意义上,新学标志着一个学术文化时代的到来和旧时代的终结。(见王先明:《近代新学——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嬗变与重构》,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23页)本文对“新学教育”的定义,源于王先明对近代“新学”的定义,主要在于区分新的教育体制与旧的教育体制之不同,与陈独秀和陈寅林所定义的“新教育”没有本质的区别。陈独秀曾经将传统以科举为核心的教育制度称为“旧教育”,将清末学制改革后的教育制度称为“新教育”。陈独秀分析指出,“新教育”与“旧教育”之不同不仅在于形式的不同(即旧教育是科举,新教育是学校)、教材种类的不同(即旧教育讲授的是经史子集,新教育讲授的是科学),最为根本的是教育主义和方法以及教育的功效不同。即旧教育主义是个人的,“是要受教育者依照教育者的理想,做成伟大的个人,为圣贤,为仙佛,为豪杰,为大学者”;新教育不专造成个人的伟大,而“注重在改良社会”。在教授方法上,旧教育采用的是教训式,即“教学生应当如何如何,不应当如何如何”,而“不问学生理会不理会”;新教育采用的是启发式,即“研究学生何以如何如何,何以不如何如何,怎样才能使学生如何如何,怎样才能使学生不如何如何”。他还揭露了旧教育的4个缺点,即“减少教育的效力”、“减少训练的效力”、“减少学术应用的效力”以及“减少文化普及的效力”等。(见陈独秀:《新教育是什么?》,《中国现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7—187页)陈寅林认为新教育是“为民主政治、国民经济、国家社会和新文化而设的教育”,其对于旧教育可以说是一种“教育革命”。(见陈寅林:《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第8页)

形势,旧学及其传统学制,仍然是士子们心力所致的主要方面。^①20世纪初,在国难日蹙的危急关头,清政府下诏改革旧制,进行教育革新。1905年科举制废除,彻底结束了传统旧学教育在中国的统治局面,近代新学教育制度最终确立了,并且走上了稳步发展的道路。

学术界对这一重大社会文化现象从一开始就给予了关注。^②20世纪随着近代新学教育的不断发展,中国近代教育的研究引起了更多人的注意,形成了中国教育史学科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除一般教育史普遍涉及近代部分外,还涌现出一批专门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史的著述,如王凤喈的《中国教育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一说1928年版)、陈青之的《中国教育史》(1926年出版上卷,1934年完成中、下卷,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陈东原的《中国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周谷城的《中国教育小史》(上海泰东书局1929年版)、黄炎培的《中国教育史要》(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余家菊的《中国教育史要》(中华书局1934年版)、李浩吾的《教育史ABC》(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版)等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华书局出版的舒新城的《近代中国教育史料》(1928年版)、《中华民国教育史料》(1931年版)、《近代中国留学史》(1927年版)、《中华民国之教育》(1931年版)、《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1929年版)以及周予同的《中国现代教育史》(良

① 王先明:《近代新学——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嬗变与重构》,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84页。

② 对于中国近代教育的研究始于191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该书虽为教育制度通史,重点却在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第一次将中国近代教育纳入教育研究范围之内,可谓开中国近代教育研究之先河。见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33页。

友图书印刷公司 1934 年版)。此外还有陈翔林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太平洋书店 1930 年版)、庄俞和贺圣鼎的《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良友图书公司 1934 年版)等等。^①

社会对于乡村教育的关注几乎在同一时期开始了。1920 年,《中华教育界》杂志刊登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余家菊的《乡村教育的危机》一文。他指出在乡村教育中,旧式私塾仍占统治地位,旧式文人仍然主导着乡村教育,当时乡村教育已经破产。《中华教育界》的同一期上还发表了金海观的一篇介绍丹麦乡村教育的文章,试图以介绍外国经验来引起国内教育界注意本国的乡村教育问题。这两篇文章引发了知识界对乡村教育问题以及乡村社会状况的重视。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黄炎培、陶行知、梁漱溟等一批社会活动家和知识分子深入乡村,开展了“乡村教育运动”和“乡村建设运动”,几乎将所关心和有志解决社会问题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乡村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并且将学界早已掀起的对乡村教育问题的讨论推向高潮,并一直持续到 30 年代中期。这一阶段有关乡村教育问题的报纸、杂志、学术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总体而言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其一,有关乡村教育的普通教育学著作。最早的乡村教育理论著作是 1923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农村教育》,这是一部师范学校用书,全书共分 11 章,讲述了农村教育的特点和制度、农村儿童的特质以及农村小学的教育、编制、设备、教学法等。此后这类著作不断涌现,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1925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国家主义与中国乡村教育》,1925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乡村教

^① 杜呈宪:《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 章。

育研究及研究法》，1926 年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出版的《农村教育丛辑》，1930 年傅葆琛著《乡村生活与乡村教育》，1935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古梅编著的《乡村教育》，1934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余家菊著《乡村教育通论》，上海黎明书局 1934 年出版 1935 年再版的《乡村教育视导》等。这些著作对乡村教育的研究概况、社会背景、目的、受教育者、教育行政、各级师范和民众教育、教育视导等方面从理论上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为我们对乡村教育和社会作进一步地深入研究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方法论。

其二，有关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的介绍。二三十年代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把学界的教育理论付诸实践，与此同时，学界对此的介绍和研究也在逐步展开。1928 年杨效春编《晓庄学校与中国乡村教育》，介绍了晓庄学校概况及作用。1929 年定县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出版的《定县牛村的平民教育》（吴雨农著）介绍该村的扫除文盲、社会工作、生计教育、卫生教育等。1930 年傅葆琛著《乡村平民教育的理论与实际》全书以 13 个专题的形式对乡村平民教育的目的、意义、实施方法等作了论述。1931 年梁漱溟著《乡村建设理论》从认识问题、解决问题两方面入手，讨论了有关乡村建设运动的起因、旧社会构造、今日乡村崩溃的由来、政治问题的解决等。1932 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学校式教育部出版的《定县农民教育》（汤茂如编）分绪论、组织及行政、调查、研究及编制、实验、推行、视导、训练、结论 9 章，介绍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实验区筹备期间的教育工作。这类著作为我们进一步认识乡村社会提供了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

其三，有关乡村教育个别问题的描述和分析的文章。如：余家菊的《乡村教育的危机》，（《中华教育界》1920 年第 10 卷第 1 期）、王晋三的《乡村教育漫谈》，（《新教育》1924 年第 9 卷第 4

期)、何有文的《关于乡村小学几个特殊问题之商榷》(《中华教育界》1928年第17卷第4期)、古梅的《发展乡村教育的中心问题》(《教育研究》1929年第13期)、李楚才的《小学教师的生活问题》(《中华教育界》1928年第17卷第6期)、傅葆琛的《我国乡村小学课程的几个缺点》(《教育杂志》1931年第23卷第2期)、厚之的《中国农村经济的衰落与乡村教育》(《平民杂志》1932年第1卷第3期)、傅葆琛的《乡村小学教师的进修问题》(《河北教育公报》1934年第7卷第21、22期)、杨效春的《普及农村教育的困难和我们的做法》(《教育杂志》1937年第27卷第1号)、王丙辰的《乡村小学儿童缺席的原因》(《教育杂志》1937年第27卷第6号)、陆德音的《中国农村教育的回顾与前瞻》(《教育杂志》1937年第27卷第6号)等文章从不同侧面对当时乡村教育所存在的个别问题如乡村小学课程、小学教师、儿童缺席等进行描述和分析。但是,这些文章主要是对当时社会现象的披露,其论述大多带有感想体悟的色彩,某些认识仅停留在直接、表面的层次,不够深入和系统,还提不到研究的层面上。然而,正是这批当事人对其所处的时代的社会问题的关注与留心,才为我们后来者留下了大量的可供借鉴的观点和资料。

此外,20世纪30年代廖泰初的《变动中的中国农村教育:山东汶上县教育研究》一书,却别具特色,学术含量极高。该书借用人类学的社会调查方法,从文化冲突的角度,分别从“洋学”和“汉学”即学校和私塾两部分,对山东汶上县的教育状况作了系统的考察和分析,从而找到“洋学”不能打入老百姓的种种现实原因。这部书虽是一个区域性的个案研究,但为我们从整体上认识和研究乡村教育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和可资借鉴的视角。

就这一时期的整体研究状况而言,有关近代乡村教育的研究